

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刘慕沙译
井上靖著
《敦煌》

历史天空下的“蝴蝶”

□房伟

井上靖的《敦煌》是一本已被经典化的“奇书”。这本书最早的版本是1959年日本讲谈社出版的，上世纪80年代，该小说被中日联合拍成电影，大部分在中国取景，轰动一时，也见证了上世纪中日的友谊交往。当然，网络小说流行的今天，历史题材往往被归于通俗传奇，比如，大女主的《甄嬛传》系列女频小说，还有穿越历史小说。真正严肃的历史小说创作，却少之又少。普通读者嫌弃它们面目可憎，读起来味同嚼蜡，专业读者又不满足，觉得它们无法达到尤瑟纳尔、托尔斯泰等大作家的高度，对当代相当多作家而言，严肃历史小说，也是一块鸡肋。写起来费力气，要查阅大量资料，不能天马行空地挥洒，一不小心，还会碰到很多禁忌。总之，严肃历史小说，是性价比不太高的小说类型，远不如都市情感、家庭伦理、悬疑惊悚编起来得心应手，还容易出版改编。正是在此背景之下，愈发显现出井上靖“中国历史小说”的重要性了。

《敦煌》的启示在于，历史小说如何有趣又有深度？中国史传统发达，小说被认为是子部的“小说部”发展来的一个分支。但这个“小儿子”在经史子集的中国文学大家庭里，并不受待见，更像身份可疑的“私生子”，与民间神话、说唱文艺有着暧昧不明的关系。吸引信众讲的骇人宗教故事，市井瓦肆的流言蜚语，虽然经过文人墨客的加工与雅化，总感觉不如“历史之学”庄严大义。由此，历史小说从讲史变成历史演义，始终不脱历史的阴影。现代西方历史小说，脱胎中世纪浪漫传奇，却在司各特之后，表征现代宏大叙事性，形成了一套精密复杂，如同高精度机器的历史文学叙事规则。由此，井上靖这样的小说家，既能将历史故事讲得跌宕起伏，引人关注，又能由此引入历史之学的严肃思考，显然更符合中国人对严肃历史小说的口味，也更有“东亚味”。井上靖自己也说，他的历史小说创作，受到中国的《史记》《左传》影响较大。

我第一次接触井上靖，是读大学时看了电影《敦煌》，接着就去找小说。从《敦煌》出发，读了《西域故事集》。当时感觉很震撼，一个日本作家，居然把中国历史故事写得这么好！读研究生期间，读了他的很多作品，如《斗牛》《风林火山》等，而后是《苍狼》和《孔子》。由井上靖引领，我对日本的中国题材作品也产生浓厚兴趣，阅读了司马辽太郎、田中芳树、海音寺潮五郎、中岛敦、芥川龙之介、陈舜臣等很多作家的小说。同属于亚洲文化圈，又与我们有很大不同的日本作家，他们看待中国的历史，的确别有一番“他者”风味。井上靖对历史小说的表现，和中国小说家非常不同，有一种迷人的“历史文学魅力”。我不得不承认，我们当代的历史小说是不发达的。我们的宏大化历史观，拒绝个体化心灵介入，总是把历史文学变成干瘪无味的模式化东西，看着庞大吓人，但就是缺乏艺术吸引力和长久生命力。中国的历史小说，受到诸多意识形态干扰，似乎很难处理好历史与文学，宏大与个体的平衡关系。好的历史小说，虚构与真实，应是其展开的“两翼”，宏大历史视野与个体生命体验，则是其凌空高蹈的“双足”。太过虚无缥缈，随意演绎，历史小说会失其厚重；太过拘泥真实，沉溺于历史还原，则失之笨拙，丧失文学的飞扬想象力。如没有宏大历史视野，历史小说会变成一面破碎的旗帜，失去雄奇阔大的魅力；而没有个体生命体验，宏大视野就可能变成无聊的铺排，缺乏强烈生命体验力和代入感。没有双翼，自然不能展翅高飞；没有双足，就不能平衡稳定，自由落地。

拿《敦煌》来说，故事传奇色彩很浓。井上靖是从敦煌卷子上一人名“赵行德”展开想象。他设计书生赵行德落榜后，因为神秘的西夏文字，远走西域，邂逅狂野的队长朱王礼和温柔的回鹘公主。井上靖没有写大人物的政治权谋和军事斗争，更多的，是从个人出发的，对于历史的真切感受。敦煌密卷是“真”，李元昊是“真”，西夏破甘州而崛起是“真”，而赵行德与朱王礼是“虚构”，回鹘公主与其两人的纠葛，更是“虚构”。真真假假，虚实实实，历史的残酷与偶然性悲剧命运的揭示，却又能唤起人类共同的神秘主义情感体验。小说涉及西域佛教史、西夏文字演变史、宋夏边疆关系、西夏典章制度与军制沿革、西域民族交流史等诸多史学知识和宏大视野，法度严谨，颇具历史情境感，同时这不妨碍小说展示诸多复杂人物复杂的内心情感与独特命运。井上靖笔下的中国人物，强悍而不屈服，他擅长描写个人与历史抗衡的意志，大历史中人的复杂内心和悲剧宿命。

也许，历史小说，兼具必然性与偶然性，更像历史的天空下那只飞舞的蝴蝶，蝴蝶翅膀扇动，历史的褶皱之中，才会涌现出更多真相与绮思……

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冯俊文主编
《倬彼云汉：许倬云先生学思历程》

且把金针度与人

□陆远

今年6月，唐奖评选委员会宣布，将第六届唐奖汉学奖授予国际知名历史学家许倬云教授，以表彰他在汉学领域的卓越贡献。

按照中国传统算法，再过几天，许倬云先生就将迎来95岁生日。目前健在的海外华人人文学者中，以资历和成就论，大约只有王赓武、金耀基可与许先生鼎足而三，堪称鲁殿灵光。许先生的学术生涯以其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深刻洞察闻名，其研究不仅深入探讨中国长期历史的本质问题，更在通史解释上强调文化的包容性与交流，寻求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定位。对于一位自幼罹患疾病，终身陷于轮椅的残疾人来说，这样的成就已可看作生命的奇迹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，即便寿近期颐，重病缠身，许先生依然能打破知识人的藩篱，走出象牙塔，不离群索居，在喧嚣的数字时代直面记者、自媒体和各类人物，成为互联网上活跃的力量。依靠先进的传播技术，今日的人类文明实已合群合众为一“文明大脑”，许先生以身体力行实践了自己作为这一“文明大脑”中一个神经单元的活力和意义。

资深出版人冯俊文，近年来一直致力于许倬云先生著作的整理出版。去年，他以极大的热忱和精力，遍邀许先生老友、及门弟子和亲近晚辈四十人撰写文章，编成《倬彼云汉：许倬云先生学思历程》一书，几可视为一部生动翔实的许先生学行录。冯先生知许先生多年前在南京大学担任余纪忠讲座教授期间，我因为特殊的机缘，曾连续数年随侍先生左右亲聆警咳，便惠赐一册作为纪念。展读本书，与许先生相处的昔日时光重回心头，历历在目，各位学界先进笔下的许先生与我印象中的许先生一一呼应，对先生的道德文章有一番更深的体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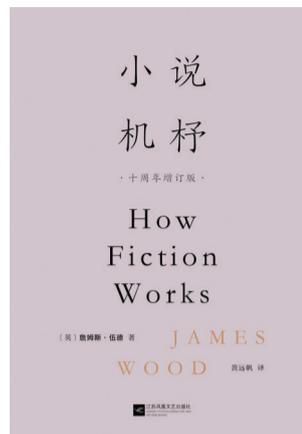
在我看来，许先生最令人感佩的品格，是他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儒者气概和兼济天下的情怀。宋朝诗僧慧洪有一句诗：“鸳鸯绣出从教看，莫把金针度与人。”劝人压箱底的功夫总要“留一手”，不可全抛一片心。许先生恰恰与之相反，是“全把金针度与人”。

许先生的金针度人，体现在两个方面。对那些有幸结识先生趋前奉教的学界晚辈，不论学术还是生活，他不遗余力地给予提携帮助。心理学家王波忆及他在博士求学期间，尽管与许先生素昧平生，依然冒昧投书请教，没想到翌日清晨就接到先生回信，“丝毫没有‘许学大师’‘华人之光’的架子”，并告诉王波“为学做人，都无止境，盼自勉亦勉人”。社会学家陈心想著作杀青，想请许先生做序，于是“带着非常忐忑的心情”写信，没想到次日就接到回信，20天后就收到将近4000字的序文。要知道，许先生身体残疾，在电脑上工作，双手只有两三根手指可自由活动，他的举动，无疑是对陌生青年学子最大的鼓舞。这样奖掖后进的例子，在书中俯拾皆是，示范了一个精神个体在人生社会中的格局和关怀。2013年，南京大学人文社科代表团赴美访问，去匹兹堡拜会许先生，刚做完重大手术的许先生不顾医生劝阻，第一时间会见代表团成员，急切地对大家说：“我今年八十三岁了，余用很少，不能再飞行了，不能回去与大家共事了。我郑重地拜托大家，如果送年轻人来，我拼着老命教他。”说到这里，许先生含泪哽咽，非常动情。我曾多次听在场的老师转述当时情形，内心的感动，无以言表。

许先生的襟怀，更表现在他始终保持敏锐思考，以著述回应事关人类文明来处与走向的大问题。作为接受过东西方最好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，他始终准备为迎接新文化的前驱喝道，他的书写和言说就是他的存在，显示他生命最真实的价值所在。历史学家许纪霖写道：“忧心忡忡的许先生，觉得历史的颠簸和挫折，使得中国文明丢失了不少本来有的好传统。他决意写一本书，重新反省中国文明，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一些余沥，足以挹注和灌溉正处于危机中的现代文明。于是他将其书命名为《中国文化的精神》”。人类学家王明珂说，“许先生的《说美国》一书，一方面感叹美国之沦落，另一方面，他更关怀的是中国的现况与未来。他将儒家思想为本而兼纳各方思想的中国文化，视为思考及规划未来中国的良方”。有些人或许不理解许先生以近百之身，还在媒体上频频亮相，在文化学者余世存看来，“这其实是不解千百年来文化在场或肉身道成者的忧患，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”。就像许先生对学生葛岩教授说的那样，“有人愿意听，我就尽力交流，来者不拒。毕竟，我们都是知识链上的一个环节，这一长链不能在我手上断线。”

读罢这本《倬彼云汉》，我想，只要世间还有许先生这样合群而觉，向死而生的示范，我们的文明就仍有庄严利乐，值得一切有情在其中生息，不会迷失。

删人快语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黄远帆译
詹姆斯·伍德著
《小说机杼》

文学的“法医”

□蒯乐昊

阅读詹姆斯·伍德，不得不说，我获得了源源不断的阅读乐趣。这种乐趣源源不断，一方面来自中年之后呈断崖式下跌的记忆力；另一方面，则来自伍德那种奇崛、拗口而又意外精彩的写作风格。其证据是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当我拿起一本詹姆斯·伍德的著作，随意翻开，从任何一处开始往下读去，都像第一次阅读那般津津有味，然而，书本上密密麻麻的划线又分明提示我，这本书我早已读过，甚至做过深度精读，但这并不影响我掉脸就忘得精光。

他那些曾经让我莞尔乃至捧腹的金句，抑或毒舌——我甚至在划线的旁边标注了“哈哈”——此刻再一次让我莞尔，乃至捧腹。

比如这句：“小说之屋，窗开百扇，门唯二三。”任何尝试写过小说，希望得小说其门而入者，冷不丁看到这句估计都会一愣，心头如被重锤，然后哈哈大笑起来。更不用说了那些通过爬墙翻窗而狼狈进入小说写作的作家了。

詹姆斯·伍德，哈佛大学文学教授，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。我此刻再次翻到的就是他这本《小说机杼》，书名便暗示出小说写作中最具难度的部分：结构。“机杼”天然带有经纬编织之感，可这本书的原名却是 How Fiction Works，要直白得多，也更指向阅读者感受到的结果，而非写作者的生产流程。这也是伍德的写作方法：以批评家的立场提问，从作家的角度回答。

好看的文学有很多，但好看的文学评论却很少，因为同时具备“不低于作家的写作能力”以及“远高于作家的阅读能力”的人太少。詹姆斯·伍德是其中一个。他的好看，很大程度上来自他诚实的毒舌，英国绅士式的毒舌，一种带着教养的刻薄。《小说机杼》的译者黄远帆就说，在英语里有个诡趣，“声名远播”(famous)常故意和“恶名昭著”(infamous)通用，而詹姆斯·伍德正是一位堪称 infamous 的批评家。在西方文学批评的体系里，有哈罗德·布鲁姆这样渴望成为灯塔和守望者的批评家，但新一代里有着“当代最佳批评家”之誉的伍德，却在很多方面与布鲁姆呈互补关系。用黄远帆的意思来说，布鲁姆在“刻薄”，伍德却类似在拾遗；布鲁姆的文学批评之声近乎“法官和先知”，而伍德却像一个法医。“伍德凭的是超额完成任务，凭一本书提取的DNA，顺手把一个作家乃至一个流派解决掉”，“伍德借书评大作文，甚至不妨当尸检报告看”。

这位文学的法医在《小说机杼》里解剖了些什么呢？叙述、细节、人物、意识、语言、对话……但他怀着一种现代主义的决心，要厘清藏在这些背后的历史流变和时代特征，写作者的意识流变，决定了他笔下塑造人物的意识流变，而现代性的小说叙述，源头来自福楼拜。“小说家感谢福楼拜，当如诗人感谢春天：一切从他重新开始。”伍德认为，是福楼拜一手建立了大多数读者所知的现代现实主义叙事，以至于这位作家在文学史上应该有纪年式的意义：小说，得分成“前福楼拜时期”与“后福楼拜时期”。福楼拜之前的那些伟大作家是无自觉的天赋依赖者，他们依靠本能勇往直前。但福楼拜是自觉的，他发明了一种摄影机式的语言，他把惯常的细节和变化的细节混合起来，并且创造出了一种“时间上的不可能性”，那种短期的事情与长期事件的并置，不同时间的情感与时间以不同速度发生，形成了文字的蒙太奇，也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开端。直到今天，小说文学的流派层出不穷，但形式主义者而后现代主义者却依然受惠于福楼拜。福楼拜自己在1852年的一封信里描述了这种尝试。“作家在作品中必须像上帝在宇宙中那样，无处不在又无影无踪。”

换言之，传统小说写作中那种“全知全能”的写作者，和个人主义写作者那种“有限视角”的写作，在福楼拜这里被结合起来，他一边主观拍摄，一边刻意藏起了他的摄影机，读者却被自动带入。

无论写作还是阅读，文学传统无往不在，任何试图反抗传统的努力，亦都反证了传统之强大。“传统本身亦如比喻，还没有死掉，却总是正在死掉。艺术家总想比它更聪明，但在斗智的过程中，艺术家亦不免建立起另一种走向死亡的传统。”在伍德眼中，传统如同老年一样不可战胜，作家一边反抗一边走向它。

对此我举双手同意，放弃反抗。

远见近拾